

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

——以文化融合为分析视角

刘胜湘 赵成

【摘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愈发多样化,全球治理进入关键期。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保障多样化的治理需求,世界亟需新的全球治理观来弥合分歧和凝聚共识。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反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关系理性主义治理观应运而生。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中国的关系性思维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思维文化的精髓,推动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和全球治理的变革,即从人类整体本位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从规则治理走向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从多边治理走向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从区域治理走向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实现全球治理观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包容性的全球治理观,这关系到全球治理的成败。

【关键词】 文化融合;全球治理观;关系理性主义;全球治理实践

【中图分类号】 G122; D61;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24)02-0158-08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23JZD030)。

【作者简介】 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赵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南京警察学院讲师。

中国全球治理观根植于自身文化,也受到西方治理文化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方全球治理观之间取得平衡,以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全球性挑战,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融合视角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文化融合即指不同价值观、规范、体制和思维模式的融合。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进化和变迁。^①“在文明、文化的互动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之中,也会构建相互转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转化而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②文化差异不一定会导致文化冲突,而有很大可能会在互动过程中相互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如果说西方自启蒙以来三百余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rationality),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③,两者结合可以生成中西方思维文化结合的关系理性^④主义。关系理性主义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是关系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融合与折中,即理性判断中含有关系性,关系性判断中有理性内涵,既不是单纯的理性,也不是

① 参见[英]埃里克·琼斯:《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王志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7页。

②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③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④ 关系理性主义中的“关系理性”是指中西方思维文化的融合,与国内有学者所提出的源自中华文化“关系理性”概念不同。

单纯的“关系性”。^①全球治理需要多元文化融合和包容性的全球治理观,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这样才能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全球治理主体弥合分歧和凝聚共识。实际上柔性的礼治体系和刚性的法治体系有可能融合和相互补充^③,东方传统和西方传统是可以结合的^④,彼此可以沟通^⑤。反映关系理性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迎合了全球治理需求发展的这一趋势,可以推动中西方全球治理观的共存和融合,并引导中国实现全球治理观的转型,进而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

学界关于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方案与责任论,认为“和谐世界”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和谐世界”理念基础上的发展,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转型,这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的责任感。^⑥二是历史文化论,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总结为“和谐世界主义”,它基于中国的历史观念、天下观念、主权观念和集体观念。^⑦正是“和合文化”“天下主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才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总体来看,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尚未系统地讨论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这正是笔者试图在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型是应对全球治理困局的需要

近些年,全球性威胁日益加剧,全球治理需求愈发多样化,而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有效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和形成全球治理领导力,中国因此提出的更具包容性和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观和全球治理转型。

(一) 全球治理的困局

当前全球治理困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全球治理失灵、区域治理成效不彰和国家治理无法形成合力。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⑧。美国主导的西方试图让全球治理机制长期处于弱势。^⑨全球治理失灵表面上看是规则体系滞后导致的,但深层原因实质是观念体系的滞后。因为规则体系建立在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滞后的、甚至倒退的观念体系不仅无法适应全球治理的新挑战,而且还会对既有全球治理规则体系造成破坏。

区域治理作为多层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但区域治理的成效不彰。在区域治理实践中,欧盟无疑是一个成功范例,然而实际上欧盟治理也面临诸多困境。欧盟的不断扩大使欧盟内部的利益协调和平衡变得更加困难,且由于欧盟治理已深入到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及司法等领域,对各成员国及其公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盟治理的合法性受到质疑。^⑩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欧债危机和能源危机等就是这些困境最好的注脚。可见,区域治理效果不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间的张力所导致,要破除区域治理的困境就必须处理好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间的关系。

当今世界由于各国全球治理能力有较大差异,全球治理责任分配存在争议,因而导致全球治理无法形成

① 参见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融合路径——关系理性主义探析》,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③ 参见宣兴章:《国际关系是关系:对存在的反思与重构》,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⑤ 参见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土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⑥ Pichamon Yeophantong, "China and disaster governance: Assessing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 glob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umber2, 2016, p.241.

⑦ 参见高奇琦:《和谐世界主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⑧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⑨ 参见[新加坡]马凯硕:《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韦民等译,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⑩ 参见卢静:《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与其治理的视角》,载于《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

合力。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言,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气候治理能力较弱,在治理中所能承担的责任有限。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其气候治理能力远超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虽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了遏制气候变暖的《巴黎气候协定》,但该协定的落实却面临挑战。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没有人可以确定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会不会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全球气候治理只是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的能力和 responsibility 方面存在差异的一个缩影,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时步调不一致,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二) 全球治理需求的多样化

全球治理需求的多样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治理主体需求的多样化、治理领域的多样化和治理层次的多样化。从治理主体上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全球治理需求。例如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地球南北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太平洋低地岛国,也会使一些国家面临异常干旱或夏季高温,同时也有极少数国家从北极冰川融化后形成的北极航道中获益。不同国家由于禀赋的差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应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了不同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需求存在差异。从治理领域上看,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需求有别。全球治理大体可以分为安全领域和非安全领域,其中安全领域聚焦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而非安全领域主要包括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全球治理领域的多样化催生了全球治理需求的多样化,而多样化的治理需求很大程度上使全球治理难以聚焦于重点和关键领域。从治理层次上看,不同治理层次的需求也不同。全球治理可以分为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在全球层次,治理需求聚焦于全球共同挑战,如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在区域层次,治理需求主要聚焦于区域共同挑战,如东盟的治理需求主要聚焦于推动区域的稳定和繁荣等。在国家层次,治理需求聚焦于不同国家的国内治理困境,国家希望借助全球治理实现国内善治。

(三) 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基本含义是极端平民化倾向,“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①民粹主义往往基于公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孤立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思潮,其含义是与其他国家的事务保持距离,避免卷入冲突,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利益。当前世界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具有逆全球化特征,表现在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就是孤立主义。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有所抬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以及欧盟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崛起反映了美欧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由于其非理性特征往往表现为狭隘的利己主义,孤立主义是这种利己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孤立主义,都与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共同体意识和协作理念相背离。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过度强调个体利益忽视全球整体利益,严重阻碍了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民粹主义思潮会阻碍国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做出理性选择,某些国家甚至为了迎合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损害全球治理合作。另一方面,孤立主义思潮会破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生动力,导致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无法形成全球共识。

二、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型的突出表现

从文化融合视角看,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型本质上是将中国的关系性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文化融合形成关系理性主义治理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模式等方面不断融合,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关系理性主义是一种强调平等关系与差序等级关系、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国内治理和区域治理之间平衡的混合思维模式。^②在关系理性主义思维影响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转型。

①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融合路径——关系理性主义探析》,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一) 从人类整体本位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

人类整体本位治理是一种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治理观,而个体本位治理是一种以个体(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治理观。这两种治理观或过于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会导致忽视个体(国家)现实的正当利益,或过于偏重个体(国家)利益会导致忽视人类的整体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分别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最终的结果都是过犹不及,从而使得由这两种治理观指导下的全球治理实践不可持续。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就是要破除狭隘极端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形成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和个体(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观。

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霸治理模式。^①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反对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到中苏关系恶化后同时反对美苏全球争霸,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权行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反霸权治理体现了人类整体本位的治理观,即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这一思想源于中国儒家的“霸道和王道”理念。“以物质性和强制性权力治理天下是霸道,霸道最终是要走向失败的;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是王道,王道战无不胜。”^②“王道”理念体现了中国的“关系性”文化,强调仁义道德等社会规范在治理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原有的“关系性”文化也逐渐吸收西方的理性文化形成了关系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关系理性主义是一种平衡平等关系与差序等级关系的混合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既重视人类整体利益,也捍卫本国的正当权益。在关系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全球治理观从人类整体本位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④报告所蕴含的“义利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全球治理观在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间的平衡。

(二) 从规则治理走向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

规则治理是以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作为依据的治理模式。关系治理“是一个进行社会/政治安排的参与协商过程,用来管理、协调和平衡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使社会成员能够在产生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互惠与合作的方式进行交往,并以此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⑤。关系治理坚持“无外”原则,保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和“历史性的多样性”^⑥,因为,关系治理的普世主义是从其作为母体的“宇宙论秩序本身发展出来的,它从不曾与该母体安全分离”^⑦。规则治理是基于规则的治理模式,强调法治;关系治理是强调以德治为基础的人治,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体现的是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⑧规则治理源于西方的理性文化,关系治理源于中国的“关系性”文化,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西方的理性文化和中国的“关系性”文化,是一种平衡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思维模式。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就是使西方个体理性主导下的利己观念转变为关系理性主义主导下的互利观念,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兼顾法治和德治,也即兼顾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治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积极融入全球治理。然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具有“非中性”特征,即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各类规则总体上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这就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公平和公正,阻碍了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解决。^⑨全球治理不应是少数西方国家主导下

① 朱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与历史经验——基于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分析》,载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⑤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3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⑥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页。

⑦ [美]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86页。

⑧ 参见刘胜湘:《中国学派还是美国范式——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研究》,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⑨ 参见赵洋:《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何以可能?——兼论中国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的“非中性”的规则治理，而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兼顾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融合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重视规则治理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关系治理弥合差异和分歧的优势，推动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如“一带一路”倡议就充分体现了平衡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中国全球治理观。

（三）从多边治理走向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

多边主义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上协调相互关系的制度形式。^②多边治理是多边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其特征就是强调全球治理的平等性，主要依靠国际制度开展治理。然而“20世纪的多边主义是以美国意愿为核心动力、全球性国际组织为制度保障、经贸互惠为扩散机制形成的等级化国际秩序”^③。可见，20世纪的多边治理的实质是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等级化的制度治理，违背了多边治理的平等性，是西方个体理性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体现。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治理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大国协商共识来决策。^④大国协调治理是指主要大国通过发展协调机制来调节相互关系并实施世界治理^⑤，是“关系性”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西方的理性文化和中国的“关系性”文化，是一种平衡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思维方式，而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就是平等关系与差序等级关系的融合与折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多边治理，并逐渐成为多边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在经贸领域，中国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国际经贸治理，遵守世贸相关规则并推动世贸规则不断完善。在学习和融入多边治理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意识到西方主导下多边治理实质是等级化的规则治理，并未践行真正的平等多边主义。进入21世纪，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显，要求全球治理实现公平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时也重视“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⑥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试图将西方理性文化与中国“关系性”文化相融合，用关系理性主义推动全球治理观从多边治理走向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如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多边治理，体现了理性的思维模式；作为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四国”成员，中国通过协调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立场，以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气候谈判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不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体现了协调的“关系性”思维模式。

（四）从区域治理走向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

区域治理重视区域组织及其制度在治理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地区组织实现区域治理的目标，是西方理性文化的体现。区域治理往往关注本地区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了区域内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治理需求。在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家治理强调国家内部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特别是国家善治对全球治理的作用，尊重不同国家的差异化治理需求，体现了中国的“关系性”文化。在面对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张力时，只有通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互动、磨合与协调，即“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才能实现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⑦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西方理性文化和中国的“关系性”文化，是一种平衡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维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2页。

②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umber 3, 1992, p. 568.

③ 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④ 参见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

⑤ 参见陈志敏：《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0-61页。

⑦ 参见蔡拓：《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

模式。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就是区域组织治理和域内国家的治理作用和需求的汇合与折中。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通过区域治理形式参与全球治理。如中国陆续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10+”机制等区域治理组织和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治理观从区域治理走向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一方面,中国依托区域组织积极参与区域治理,例如中国通过东盟“10+”机制积极参与亚太区域治理;另一方面,中国十分重视区域国家自身的治理需求,帮助区域国家实现善治。以中老合作为例,“中老铁路”项目积极对接老挝的治理需求,为区域内国家间实现互联互通打下坚实基础,使老挝由“陆锁国”变“陆联国”。

三、以包容性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变革

中国提出的包容性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国也用实际行动践行其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包容、均衡和公平公正的方向变革。

(一) 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

由于受到西方个体理性文化的影响,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长期秉持个体本位的全球治理观,其本质是维护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西方的个体本位治理模式导致全球治理难以达成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全球治理的这一需求。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全球政治理论的精华……其核心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全球治理的目标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人类的整体利益也包括国家利益,与西方强调自身利益的个体本位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运用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关系理性主义平衡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和平等关系,推动全球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强调义利并举与合作共赢,打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思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治理主体的全球治理观的融合。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一方面,中国积极做出并切实履行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要支持和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发展利益,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义务。兼具人类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理性主义义利观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变革。

(二) 通过对外援助践行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

对外援助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对推动全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西方主导下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成为其干涉受援国内政外交的工具,例如直接将援助资源投入受援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或以受援国进行此类改革作为援助条件,进而影响受援国的内政和外交。^③在开展对外援助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往往忽视受援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质,以自己为参照系制定非中性的对外援助规则,对外援助通常附加政治条件,将援助与变革挂钩,这是西方主导的规则治理的典型产物。不同于西方国家采取的干涉内政式对外援助,中国开展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主权,重视运用平等协商的关系治理模式,受到广大受援国的普遍欢迎。

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就是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融合实践。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援助机制,通过参与制定援助规则,保证多边援助机制的公平公正。如在对外援助新冠疫苗方面,中国积极参与由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提出并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按照规则治理的模式向有需要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另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09月29日。

②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③ 参见王钊、黄梅波:《援助外交的世纪之变》,载于《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一方面,中国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以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确定援助外交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以合作关系取代“施赠—受赠关系”。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为例,中国将对非援助视为中非之间南南合作的一部分,在对非合作中始终践行“四个坚持”和“五不”原则^①,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②融合了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中国全球治理观引领对外援助方式变革。

(三) 通过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践行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

西方国家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主要采取以西方为中心的多边治理模式,其实质是等级化的规则治理,“七国集团”和“北约”就是该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当西方主导的多边治理受到质疑和阻力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会采取霸权与战争治理模式。无论是“非中性”的规则治理还是霸权治理都不能有效化解全球治理困局,甚至还会制造出更多的全球性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23年开始的巴以战争所导致的恐怖主义蔓延和难民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与西方不同,中国秉持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一方面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国家不分强弱大小都应平等参与多边治理;另一方面强调大国协商一致推进全球治理。

平衡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是实现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积极参与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推动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在中美关系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中国依旧与美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积极开展协调与对话合作。2021年4月和9月,拜登气候特使克里两次来中国协调气候立场。同年11月,中国和美国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体现了大国协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23年7月,克里再一次来华就应对气候危机同中国协调立场。

(四)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

西方国家的区域治理模式由于过于重视区域组织及其制度在治理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域内国家治理的作用及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治理需求,导致区域治理效果不彰。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与西方国家不同,受关系理性主义的影响,在全球治理中既重视区域组织及其制度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也尊重国家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和域内不同国家的差异化治理诉求,最具代表性实践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一方面重视区域组织及其制度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了理性文化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积极推动区域治理目标与域内国家治理需求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关系性”文化的思维方式。如中国在东南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既充分尊重东盟在区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坚持东盟在本地区治理中的牵头作用,又重视东盟不同成员国的国内治理需求,努力在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间取得平衡。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东盟发展战略,将东盟作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心。2018年中国和东盟通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2019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另一方面,由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治理需求的差异,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展政策对接的重点领域也不尽相同,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治理需求。如在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治理过程中,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中国将“对接重点集中在数字技术、智慧城市等领域;而对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国家,则侧重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合作”。^③

① “四个坚持”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五不”原则即: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http://www.cidca.gov.cn/2021-11/26/c_1211463152.htm。)

③ 姜志达、王睿:《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载于《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

四、结语

当前,全球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在世界蔓延,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由于治理主体间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治理主体具有不同的全球治理观。促进治理主体间的文化融合,推动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观已经成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重要途径。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观念的融合并不是完全消弭文化差异,文化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和而不同”,即虽然彼此间存在文化观念的客观差异,但不影响双方互相理解,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关系理性主义是一种融合了西方理性文化和中国“关系性”文化的混合思维模式,中国在“关系性”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有益成分,形成了兼具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关系理性主义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实践能够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交流和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找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和观念共识,并最终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观的融合。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实践为处于困境中的全球治理带来了一丝曙光,它用事实证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参与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变革,破除了“文明冲突”自我实现的预言。比较而言,东方容易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而西方似乎较难接受东方的关系主义文化。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和治理变革需要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应当顺应时代变化,用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非西方的全球治理观,并在全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西方与非西方全球治理观的融合。可以预见,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和全球治理的变革需要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会随着全球化进程而不断演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全球治理必将出现更多的文化融合实践,出现理性治理观、关系治理观与世界各地的本土治理观融合的复合型融合治理观,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文化和新的世界社会与秩序。放眼未来,世界仍会面临各种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而不同文化背景的治理主体能否形成包容性的全球治理观,这直接关系到全球治理的成败。

[责任编辑 赵宁宁]

The Turn of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ntegration

Liu Shengxiang Zhao Cheng

Abstract: Currently, the world is fac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global challenges, which calls for global governance of various kinds, and global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is urgently needed to bridge differences and reach consensu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global governance. The western-led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has been proven not satisfactory in dealing with those challenges,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relational rationalism-based governance concept” feat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Relational rationalism integrates the relationalism in China and rationalism in the west, giving momentum to the tur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oncept and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cept sees the turn from mankind-interests-centered governance to the governance featu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mankind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from rule-based governance to rule-relation-balance governance; from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to the governance featu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multilateralism and major country coordination; from regional governance to regional-national-balance governance. The key of the turn of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li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clusiv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ulture Integ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Relational Rationalism;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